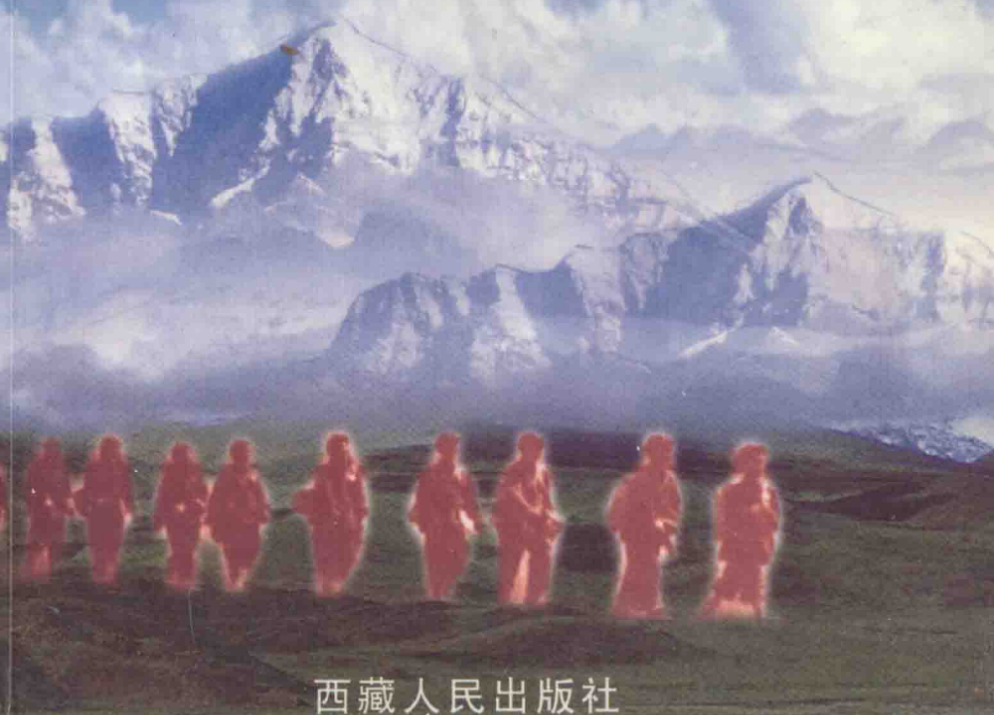


首批进军西藏的 女兵们

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首批进军西藏的女兵们

西藏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 编
《首批进军西藏的女兵们》编辑委员会

(下)

西藏人民出版社
2001年·拉萨

责任编辑 张慧霞 晋美旺扎

封面设计 丹 朗

首批进军西藏的女兵们

(下)

西藏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编
《首批进军西藏的女兵们》编辑委员会

*

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西藏人民出版社汉编室排版
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20.125 插页:2 字数:500 千

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1—5,000

ISBN7-223-01393-1/I·333

定价:60.00 元(上、下册)

门巴牙古都

孔宪云

初 到 甘 孜

我是从西南军区卫生部直属第一总院调到十八军的。当时我爱人已调十八军卫生部任医务主任。十八军组织先遣部队进藏，司令部、政治部、后勤部各选一部分人员组成前方司令部，已先期进驻甘孜，我爱人张学彬也在内。我是1950年8月由军后方驻乐山的卫生部调到甘孜，我们就是在甘孜结婚的。

前方司令部进驻甘孜，一方面可使部队直接接触藏族同胞，了解他们的生活，熟悉情况，适应高原气候；一方面更有利于进藏准备工作切合实际。初进藏时，藏胞对我们不了解，语言又不通，不能直接交流，加之由于历史原因，藏汉之间有着很大的隔阂。因为语言不通，只有用自己的行动做一些群众影响工作。我们一到甘孜驻下，在卫生部驻地开展门诊，为群众治病，使我们的影响逐步扩大。当时藏胞有病习惯去喇嘛那里打卦，寻求治病的办法，喇嘛打卦就打到我们这里来看病，这样看好了也是他卦打得灵。我们在甘孜住了约半年，治好了不少病人。开始有的病人不愿打针，我们就尊重他们的意见不打针，而后来逐渐地我们可以为他们开展一些小的外科手术，如兔唇修补术，提高了解放军在群众中的威

信。

我们同时也注意为西藏上层人士治病，德格“土司”（头人）就是一个例子。德格地区处在甘孜和昌都地区之间，“土司”有病，领导派我去，这还是我第一次骑马，两天后到达他家。经诊查后，他可能患的是肺结核。第二次把我们在甘孜当时唯一的一架 X 光机带去检查，最后诊断为肺结核，经我治疗后，病情好转，他十分感谢。

我们在与群众接触中，一大障碍就是语言不通，于是就开始学藏文、藏语。当时有一位老者，西康人，藏文很好。我们就请他教我们。我们在看病时逐渐可以与群众进行简单的交流，一般用语已听得懂了。群众中流行着一句话，“金珠玛米门巴牙古都”（解放军医生好）。

进军拉萨途中纪事

从甘孜到拉萨全部要靠徒步行进。在甘孜准备了半年，军部组织了精干的前方领导机构。张国华军长、谭冠三政委、李觉参谋长、政治部刘振国主任以及司令部、政治部、后勤部包括卫生部各单位四百余人。我们卫生部仅 20 人。当时卫生部长调回北京工作，副部长留在后方，前方由张学彬同志负责。20 人中只有我一个女同志。药品器械精简到只有 3 个驮子，6 个特制的箱子，每个驮子驮 2 个箱子。

1951 年 7 月 1 日，前方司令部从甘孜出发。从甘孜到昌都途经横断山脉地带，行进中要过高山、渡大江。从东向西要过雅砻江、金沙江、澜沧江，要翻雀儿山、夹皮拉山、达马拉山，这些山都是海拔 5000 米左右，终年积雪。记得过雀儿山快到顶时，出现了一处左右都像是风化的山石峭壁，人行其间，虽然是晴天，但天空不是高原常见的蓝色，而是灰黑色的，寒气逼人，使人毛骨悚然，至今

难忘。此地海拔已超过五千米。

高山上气候有一个规律，到中午以后就常常会有突变，会有突如其来的大风雪等恶劣的天气。我们翻过雀儿山时，时间已稍晚，突然乌云滚滚，风雪袭来，雷电交加，接着一阵鸡蛋般大小的冰雹，打得人马无处躲避。幸好时间不很长，没有造成重大损伤。所以我们行军都是尽量早起、早走、早息。到下午二三点钟，架起帐篷，人马休息。这时我们还要注意有无病号需要治疗，有时住地附近也会有牧民前来求医，我们也随时为他们治疗。下得山来，一路下坡到金沙江边，气温又热得使人难受。渡金沙江，是用当地的牛皮船。这种牛皮船像个大盆，看上去非常简单，一次只渡三四个人。听阿沛·阿旺晋美介绍，这种船渡江从来没有出过事。

到达昌都后，我们在昌都休整了1个月，随后由昌都经丁青、沙丁、墨竹工卡开始向拉萨挺进。这一路地势高，空气稀薄，很少有人行走，行军中有时一天几个小时只走了十几里路就得住下来。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过了沙丁要翻冷拉山，山上覆盖着厚厚的冰层，过不去，临时调来工兵将冰层开掘成梯级冰阶，部队依次小心地翻越而过。由于当天路很难走，费时，人马劳累，在部队全部翻过山后已将近下午4时了，只得在山下不太远的较平坦的坡地上宿营。

在丁青时，李光明同志（谭冠三政委的爱人）因路途劳累发生流产大出血，事出危急，我和张学彬同志商量认为还是应当做刮宫术以求止血。当时连输盐水的条件都没有，也没有做妇科手术的器械，只能将简单的外科器械放在水中煮沸消毒后进行手术。

在拉萨开展门诊

部队进入拉萨后，举行了庄严的入城仪式。随后，我们也开始了治疗工作。10月的拉萨，天气开始变冷，我们搬进藏军第四代

本(相当于团长)的营房居住。这是藏式土墙房子,留出两间做诊断和治疗疾病用。这时前来求诊的藏胞日渐增多,每日可达数十人次,不单是拉萨市民来就诊,也有从远道而来就医的。有一次达赖喇嘛的经师(不记得名字了)患病,病势凶猛,他年龄又大,高烧达 41°C ,很快处于昏迷状态,经他们打卦,已宣布无救,准备后事了。有人提议让解放军医生试一下。我被派去出诊,经检查发现病人患的是肺炎,服药治疗后很快控制了病情,高烧消退,神志恢复,经几天的治疗,病就好了。还有一名贵族,名叫贡嘎,原来也是喇嘛,后结婚成家不当喇嘛了。他患的是伤寒,高烧不退,解不出小便尿潴留,他提出要来住院,我们只有两间房子,房子又矮又黑,跟他们贵族家的房子不能相比,但他本人坚决要求住下。给他安排了一张床住下,我们为他导尿,放出大量尿液,缓解了他的痛苦,使他周围的人惊异不已,不久治愈出院,夫妇二人感激万分,还要求照相留念。



藏族群众排队候诊,1952年初摄于拉萨

进入 1952 年,我的产期到了。我是在甘孜结婚的,到这时已整整 1 年了,幸运的是最后这两个月是到拉萨后的安全环境中生活的。如果仍然是在路上,天天爬山涉水,在那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上走路,真有些不可想象。当时进入拉萨的人员生孩子这是第一例,没有经验。由于条件有限,没有什么可准备的,怕孩子出生睡在地上太冷,那时有一张桌子,就用抽屉当做婴儿的床。我一滴奶也没有,当地也无法买到牛奶,我设法向藏胞买了一头羊解决问题。部队进入拉萨,由于供应困难,迅速动员开荒种地。高原上日照强烈,种出的菜长得特大,土豆长得一个有二三斤重。我们在自己住地周围能种菜的地方也种了菜,以补充新鲜菜,增加一些营养,这对孩子来说,更是雪中送炭。后来我和学彬商量给孩子起名字时,感到自从我怀孕后一直在高山上走路,孩子就像是在高原雪山上翱翔着,就叫“翔珠”吧! 象征着飞翔在珠穆朗玛峰雪山之上。

对群众的诊病工作,影响日渐扩大,前来看病的日渐增加。当时中央工作队随队医务人员陈集舟、陆钟琦、陈学存、刘国声等 4 位大夫,与我们卫生部医务人员一起,成立了一个门诊部,设在西藏地方政府划出的叫“联欢社”的不大的房子里,专为藏胞看病。初到拉萨,由于历史上形成的藏汉隔阂,群众不了解我们,我部队人员外出,有遭到打黑枪的,暗中用石子打击的更多。我们在联欢社开设门诊,所用仪器、药品,怕遭到暴徒破坏,就早上带去,晚上又带回。

1952 年西北医疗队、西南医疗队、中央工作队随队医务人员,以及随张代表入藏的医务人员均到达拉萨,成立医院的时机成熟了。9 月 8 日拉萨市人民医院举行成立大会,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张经武、张国华参加大会,张国华书记首先讲话,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也讲了话,张学彬以院长身份讲了话。我由部队转业调到地方任拉萨人民医院医务主任,中央卫生部卫生工作队队长董克同志任副院长。医院设床位 50 张,成了一所各科阵容强

大的医院，院址是一处贵族的房子，楼上做工作人员的宿舍，楼下为病房，门诊仍在原联欢社。医院成立后，病人日渐增多。

藏历1月间，藏族群众有一个盛大节日，在此节日期间，拉萨市人口大增，这时是打架斗殴事件多发期。医院成立后遇上第一个这种节日。1953年2月，就有一人因打架被刺伤7刀，肾脏刺破，胸腔穿透，生命垂危；另一人手臂被砍断。俩人均住院治疗，伤情得到了控制。由此医院在群众中信誉颇高。另有一藏族中层人士，因玩枪走火，伤及头部，左眼大出血危及生命。经医院抢救虽左眼失明，但生命保住了，病人感激不尽，一再要向医院表示感谢。有些病人痊愈后还纷纷向毛主席像和医院献了哈达。

部队进驻拉萨后，了解到西藏的藏医机构叫“门则康”。我们决定登门拜访，学习和团结藏医。经领导批准，张学彬和我还有徐乐天大夫一同去拜访。负责“门则康”的喇嘛名叫钦觉罗布，大约有50岁左右，他带我们看了场地、药库。经了解，藏医与中医相仿，大都用的是草药，但也有迷信部分，如达赖身上的物品均可成为药物，他们也吸收新医学知识，如学用“青霉素”。后来，我们医务人员常到他们那里参观学习，拉萨人民医院成立时也请他们参加。

往事回眸

张素珍

进军西藏，巩固国防，解放祖国大陆最后一块神圣领土的任务，光荣地落在了我们十八军干部、战士的肩上。当时我是军文工团的一名文艺兵。在整个进军西藏途中，我们这些女兵和男同志一样登高山、卧冰雪、趟冰河，还要克服着男同志没有的特殊困难，月经失调，患妇科病，但没有人退缩，而是勇往直前。

说实在的，男同志比我们负重更多些，苦差事更多些，因而在与天战斗的进程中，我们团有3位男同志：尹学仁、张国藩、邓群阶倒下了，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，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将永远怀念他们。

“惊马”之患

1950年春，军直在乐山召开进军西藏动员大会后，大家便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的。每天早晨全副武装快步行军，以提高身体素质。一天，正在大街急行军时，司令部通讯营驮着满驮子电线的马惊了，从我们后面狂奔而来，身后的同志们惊叫：“马跑了，马跑了”，我走在前边还没弄清怎么回事，马已将把我撞出几米远。我

是解放军，岂能趴在地上不起来，起身往前冲了几步，但又晕倒在地，。分队的同志雇了一辆黄包车，将我拉回驻地。经过治疗有所好转，这时我们又往新津进发了，因没有完全恢复，我没能随团步行，而是坐生活车到目的地，那时我仍在便血，经过继续治疗身体大有好转。一次利用去成都打球（我是十八军“战士队”女篮队员）的机会，同志们陪我去华西医院检查，医生诊断：便血是肠胃受伤造成的。自被马撞之后，表面看没有什么变化，可体内种下了祸根，经常出现头晕。一次给连队演出，刚从前台下来，便晕倒在后台。那时年轻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到了高原发病率更高了。最严重的一次是到了拉萨，我们文工团和由西北进藏的独支文工队联欢的晚上，全团同志都在院内欢聚。我病了几天，一人躺在没有灯光的地铺上不能动，忽然病情恶化，身边无人，幸而二区队长张彩云路过我们分队门口，听到我的呻吟声，点灯一看，发现我难过的样子，马上找来医生。医生扳开我的眼睛说黑眼球看不到了，我也感觉到心脏的下半部分突然像跑了气一样瘪下去了。分队的同志们来了，都很紧张，医生往我十指扎针都毫无感觉，可我脑子很清醒，医生和同志们说的话我都听得很清楚，就是自己说不出。听同志们的议论，我想生命可能就要结束了，但我一点也不怕。经过抢救，硬是把我从死神那里拉回来了。到了拉萨后，文工团除每天的排练演出外，有时还有统战任务，和贵族小姐打篮球，联络感情。同时也为活跃部队业余生活常组织球赛，但每次下来都出现便血现象。

郑旭——我崇敬的副政委

郑旭，是在新津时调至文工团任副政委的，她长得很像男同志，长期革命斗争的磨练，使她除了不乏女性的温柔体贴，还具有男性的刚毅果断。她处理问题不怕鬼、不信邪，事事以党的方针政

策为依据,从不以自己的好恶用事,这一看法是经过真正接触后和在以后的回忆中才体会到的。在部队,我们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,衣食住行都有统一的安排,无需自己操心,一天到晚无忧无虑,就是有点不高兴的事,也在每天班务会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了,同志之间真诚相待,没有什么事要找团领导解决的。真正接触郑旭,还是在昌都战役前后,军首长决定文工团抽部分团员和豫剧队组成前方文工团,到前方慰问演出,我也被抽调,那是1950年9月,前方文工团由郑旭带队,从邛崃向甘孜进军,沿途还给驻军演出。到了康定已是国庆1周年前夕,康定有关部门正在召开有地区藏族僧俗上层人士参加的大会,要文工团为之演出,任务交给了豫剧队。小演员们个个生龙活虎,精神饱满地为迎接国庆,为藏族同胞和进藏第一场演出做好了准备。在临近开场时,一名叫王绥德的老职员,拉着一名小男演员来到后台,硬说他忌荤,晚饭菜里有猪肉,没吃饭,不能上台,给郑旭来个下马威,郑旭没发火,不着急,耐心做思想工作,讲明这次演出的重要意义,要演好,不能有闪失,小演员戏不重,快吃点东西,坚持上台,以后注意他的伙食,王绥德就是不依。开场锣鼓都打起来了,没时间再纠缠,副政委当机立断换人,一场故意给郑旭难堪找茬的事件解决了。王绥德祸心未能得逞,却贼心不死。到了甘孜后,他仍不遵守党的政策和军纪,副政委对他进行耐心教育,他不接受,在旧社会养成的恶习不改。豫剧队的小演员和绝大部分职员,在旧社会吃尽了苦头,很容易接受革命道理,很快提高了政治觉悟,他(她)们说话了,站出来揭发、控诉王绥德的罪行,王原来是一个十恶不赦,欺压虐待孩子、奸污幼女的罪魁祸首。经过核实,送军部保卫部依法严惩。从此全队真正解放了,人员的积极性空前高涨,高原的冬天是奇冷的,小演员们不畏严寒不怕苦,演好每场戏。我记得有位演李逵的演员,名叫大虎,晚上都是光着上身在露天舞台上耍他那对板斧,我们身着大衣还冷得打颤,大虎才是个十一二岁的娃娃呀!他

(她)们就是这样为战士、为藏族同胞捧出一颗颗纯洁的心。一幕幕的动人剧目,鼓舞了战士,联系了群众,赢得了首长的赞扬。

郑旭,是一位一心为革命,勇敢坚强的抗日战争时的年轻“老同志”,她当过模范、立过功,在长期的南征北战中,得了肺病。在甘孜,我经常发现她咳嗽,把痰吐在手帕里,她肩上的担子太重了,前方团一百多人的吃喝拉撒睡,工作安排,思想教育全部要由她作主,她不健壮,可她从来没有在我们年轻人面前表现出一点疲惫。白天各项工作要做,晚上还要查铺,谁的被子掉了,还要给盖一盖。她关心下级细致入微。结婚好几年了还没有小孩。在甘孜她怀孕了。一天要去演出时,豫剧队的小鬼扛着一捆道具在前边走,她跟在后边,不知为何,扛道具的小鬼无意中一扭身,道具碰到了她,她流产了。就在那种情况下,她仍然和平常一样忙碌,我们当时也不懂,更无法去关心她。她那时只有二十六七岁,就因为她是党培养多年的共产党员,她能做到常人所做不到的事。

在工作中,她坚决按党的政策办事。1950年四川已实行减租退押,我们前方团的童莹华是泸州人,地主家庭出身,她家乡地方政府给部队来信要小童回去,郑旭深刻领会党的一贯政策:“家庭问题看本人,历史问题看现在,出身不由己,道路可选择。”小童当时只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,参军前是名学生,来文工团后工作热情很高,表现不错。斗争不能扩大化,不能因家庭出身而牵连她。郑旭没有把小童送回去,而是坚决按党的政策保护了她。

从甘孜往昌都进军,过了雀儿山,夜宿柯洛洞。第二天一早,郑旭又带着苏德勋他们打前站的几个小伙子出发了,沿江而下,山路曲折又狭窄,左边是高耸的雀儿山,右边是湍急的江水。苏德勋还牵着他们区队的一匹大青马,这匹马胆子特别小,走着走着,拐角处一位背着牛皮船的老乡突然出现在面前,马不知为何物,猛然惊了,郑旭他们已拐到山的另一面。苏德勋一个人紧拉缰绳想制服它,未能如愿,马反而拖着他拼命的横冲,结果人马翻到了寒冷

刺骨的河里。其他单位打前站的同志看到都惊呆了，齐声喊：同志，松开缰绳！危险！苏德勋没想个人安危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保住马，保住驮子，死死抓着缰绳不放，岸上观望的同志都互相询问这个同志是哪个单位的，真勇敢。马在河里折腾了半天，见甩不掉牵马的人，无奈，又拖着苏德勋往岸上冲，马累极了，不跑了，苏德勋虽然精疲力尽，但仍坚持把驮子卸下，擦干马身上的水，让它休息啃草，自己才把滴水的棉衣裤脱下来拧干，铺在地上晾晾。棉衣裤无法换，只好靠体温焐干，好在太阳出来了，人马略休息又上路了。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，对已走到前面的郑旭来讲是不知道的，苏德勋赶上他们时，郑旭很生气的当面批评：你是怎么搞的，打前站打到后面去了。苏德勋将发生的情况说明后，她才知道自己的批评有误，到了昌都，她给苏德勋记了三等功。她就是这样一位爱憎分明，掌握原则，不让一个同志受委屈，让人从内心尊敬的政治委员。

初到甘孜

我们在康定庆祝建国1周年后，马上直奔甘孜。到甘孜已是晚上了，汽车停在解放桥头，放眼往山坡上望去，呀！俨然一座“天宫”，灯火辉煌，光芒四射，甘孜竟是这么美的仙境。下了汽车，背上背包，像登天一样，经由小巷，一步步登向宫殿，走近一看，却原来是一座尼姑庵，里面点着三层酥油灯，光芒就是它们发出的。这晚女同志就被安排在庵内一间大空房住下，男同志不准入内，他们住在院外的小院内，第二天女同志也搬出了庵。那个辉煌的景观给我留下至今难忘的记忆。

甘孜已是真正的高原了，空气稀薄且干燥，人人喊喉咙痛。据先遣部队的经验，要想缓解，多喝水，喝酥油茶。郑旭副政委、伙委会和炊事员经常研究吃喝问题，唱戏的、唱歌的没有嗓子怎么行，

为了去火，烧萝卜水喝，有的同志闻不得酥油味，闻到就恶心，炊事班就变着法地做内地式的油茶，内容非常丰富，可有人还是吃不下，为了适应高原气候和食物结构，必须吃，这是命令。没办法捏着鼻子喝吧！还好，我完全没有这些反应，就是空气干燥，造成鼻子流血，每天起床就开始流，那时又没有脱脂棉，只好用纸团塞着，一塞就是几个小时。空气本来就稀薄，再塞着鼻子用嘴呼吸，嗓子更干，真是难过极了。折腾了四个多月，后勤部来了一位专家，给我开了药使用，鼻血才逐渐停止。但从此落下个慢性鼻炎，经常流血不止，鼻子再也嗅不到香和臭的气味了。

“精神会餐”

从甘孜一路走来，过昌都到丁青，肚子没受一点委屈，沿途都有兵站，补给及时。可是从丁青往沙丁宗前进情况就大不一样了，开始饿肚子了。到了沙丁，吃不饱饭，我们便到老百姓收获过的地里寻找遗弃的小蔓菁充饥。离开沙丁进入大雪山无人区，见不到飞鸟，见不到猛兽，连个小地老鼠都见不到。山越来越高，积雪越来越厚，空气越来越稀薄，体力消耗越来越严重，连无声的战友——马，也刨不到一根可充饥的草了，马开始死亡。我们文工团每人每天定量只有半斤代食粉，两根像中指大小的蛋黄蜡，在这寸草不生，终年积雪不化的高山上，炊事班也难做无米之炊了，只好由各分队用固体燃料做糊糊喝（炊事班做的也是照得见人影的代食粉糊糊）。文工团成员绝大部分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，女同志负重25斤，男同志三四十斤，每天行军五六十里，吃的那点照见人影的稀糊糊顶什么用，两根蛋黄蜡是一天的附加品，怎敢大口吃，只有饿极了，取出来啃一点点，像嚼口香糖一样在嘴里翻来复去地咀嚼，让带有蛋黄味的口水慢慢吞进胃里，总比单纯的口水质量高一点吧。人饿极了，总想着吃，不由自主地山南海北乱侃，革命队伍

成员来自四面八方，各地有各地的特产，吃过的没吃过的，大家都争相说着自己家乡的美食，在胡乱侃中早把饿肚子的事给转移了，大家才发现，这种办法还真有效。所以每天一上路精神会餐就开始了，一路上我们就用这种办法来解决饿肚子之苦，应叫它“精神会餐解饥肠”。

马 流 泪 了

记不起是谁给我说过，马是不会流泪的，不知是否有专家论证，但我确实亲眼看到马流泪。在没有补给的高原行军，不仅人吃不饱，更无法满足马的草料供应，因为高山上连草根或地衣都见不到，每天只供给它们几把黑豌豆，比给人供应的还少，可它们的负重又比人重多少倍，长时间的饥饿马是无法忍受的，它们不会说话，也无法来个精神会餐，只有默默地走着。一天又轮到我们的分队走在全团的后面，分队副又走在分队的最后，兼有收容任务，我当时是分队副，当然走在队伍的最后了。二区队八分队朱华同志牵的马走不动了，慢慢掉队了，我必须收容她，何况一个女同志带着马掉了队是很危险的，我俩离大队越来越远，马实在走不动，我们就一个在前边牵，一个在后边推，推一下马走一步，实在没法，就把驮子卸下，让马休息喂它几颗豌豆，再上驮子走，走不了几步马又不走了，就这样我们反反复复做着上驮子、下驮子，前边牵后边推的动作，天快黑了，我们是无法赶上大队了，便请司政单位掉队的同志代为告知文工团派人接我们，因为马驮子上有很多公用物资，我和朱华是无法弄走的。口信一个个传出，还不见人来，我们还是想法让马走，马无论如何也不走了，眼泪哗哗流下，它确实是寸步难行了，我们抚摸着它的头，安慰它，它也用脸亲热地贴在我们的手上，眼泪流个不停。我们好难过，它是无声的战友啊！天全黑下来了，别的单位掉队的同志也走完了，团里还没有派人来，一个大

山头就剩下我们两个女同志了。我俩警惕起来，注意四周的动静，还好什么都没有。不知等了多长时间，二区队的徐文艺终于骑着大黑马来了，把驮子换在大黑马背上，我们只好将那匹流泪的马丢弃了。以后的岁月里，还不时想起那匹马，想起当时的惨状就伤心，不知它离开我们后怎样了？

三 迎 国 庆

庆祝开国大典是在湖南茶陵举行的，当时天还没亮，机关的同志还没有起床，文工团的人早早梳洗打扮完毕，背起腰鼓和各种乐器直奔大会场，新中国成立了，蒋家王朝彻底完蛋了，好不兴奋；第二个国庆日是在康定过的，我们第一次在藏族地区演出，和藏族同胞一起庆贺；第三次是在我们走出无人区的大雪山，到了太昭地区的鹿马岭，这里海拔4000米，生平第一次听到远处传来的驼铃声，开始不知道是什么，感到很神秘。这里已有森林，有供做饭用的干枯树枝，喘气均匀些了，拉萨在望，苦尽甜来了。在这么好的环境中我们迎来了国庆3周年，领导决定国庆这天每人供给1斤代食粉，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，虽然还是糊糊，总可多吃点，把肚子填饱一些，有的同志按耐不住喜悦的心情，总在行军锅边转。锅是就地挖坑埋灶的，不记得是谁了，一脚将坑踩塌，一锅稠糊糊全倒了，多让人扫兴！剩下的一锅，百十号人怎么够吃。好在我们吃惯了苦，理解他的心情，没有人埋怨。解放军本来是在困难中成长起来的，有困难全体顶着，你谦我让，最后还没有吃完。虽然没满足肚子的要求，但总算在国庆这天吃上了一顿稠糊糊。